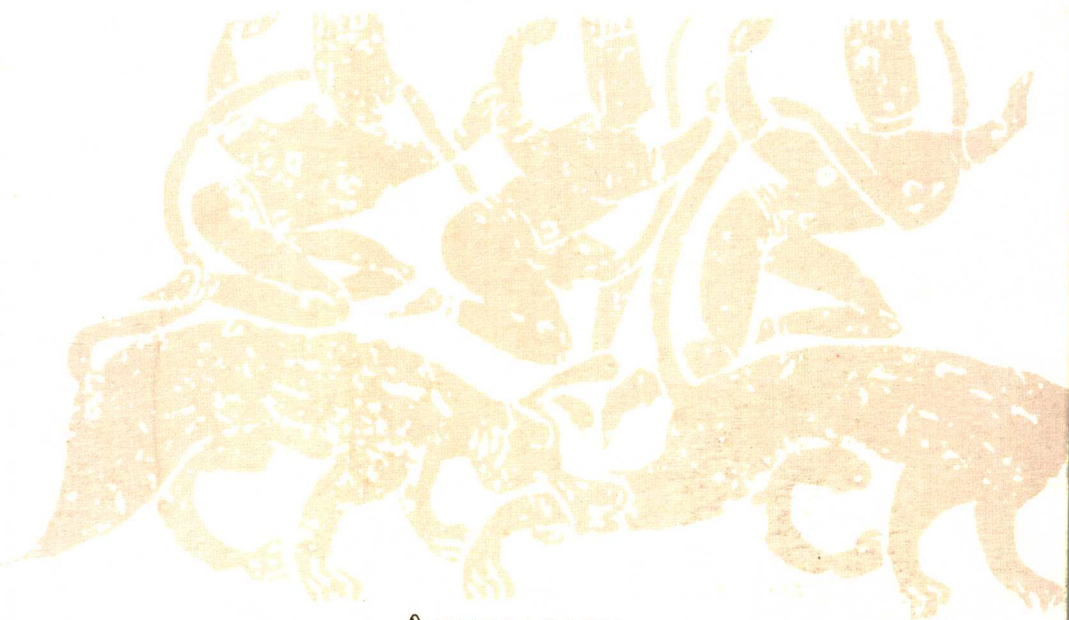


碑銘所見前秦 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 著 ■ ■ ■ ■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碑銘所見前秦 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馬長壽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馬長壽著.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6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叢書)

ISBN 7-5633-6049-2

I. 碑… II. 馬… III. ①氏族-民族歷史-研究
-關中②碑文-中國-古代 IV. 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17957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號 郵政編碼:541004)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山東省濟南市勝利大街 56 號 郵政編碼:250001)

開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張: 4

字數: 89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 ~ 4 500

定價: 15.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作者簡介：

馬長壽（1906～1971），字松齡，山西昔陽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一九三三年中央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留校任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在中央博物院工作，多次深入四川西部進行民族調查，撰寫和發表了一批民族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此后，又先後執教于東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任教授。一九五〇年轉入復旦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少數民族史。一九五五年調入西北大學任教授，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南京。主要論著有《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氐與羌》、《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國》、《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彝族古代史》、《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報告》、《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即出）、《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等。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叢書

- ◇ 北狄與匈奴
- ◇ 烏桓與鮮卑
- ◇ 氐與羌
- ◆ 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 ◇ 突厥人和突厥汗國
- ◇ 漢趙國史
- ◇ 敕勒與柔然
- ◇ 南涼與西秦
- ◇ 吐穀渾史
- ◇ 唐代黨項

組稿編輯：張 靜
責任編輯：張 靜
裝幀設計：孫豫蘇

總 序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還對東亞、中亞，甚至歐洲的歷史均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因此，中外學者均十分重視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為國際學界研究的熱點或專門學科，如所謂的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西夏學等。中國傳統史學對周邊的民族，特別是北方民族的記述和研究歷來十分重視，有浩如烟海的文獻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而我們編輯出版的這套《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叢書》，即是反映二十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國內研究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歷史的成果之一。

這套叢書所輯的論著，是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馬長壽教授及其弟子周偉洲教授的有關著作。馬長壽教授（1906～1971年），字松齡，山西昔陽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早年他多次深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調查，引進西方近現代的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發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他先後在復旦大學、西北大學執教，並開始轉向中國少數民族史研究領域，對中國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等族的歷史和文化，作了新的開創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能融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和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精華為一體，以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重視民族調查和考古文物資料，史實與

理論相結合等。因而，他的這些學術特點逐漸發展成獨具一格、自成體系的學派，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叢書》中收輯有馬長壽教授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寫的五部著作，即《北狄與匈奴》、《氐與羌》、《烏桓與鮮卑》、《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國》。其中《氐與羌》和《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兩書，是在一九七一年馬長壽教授逝世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學家林幹先生評價《北狄與匈奴》一書時說：此書“是解放後第一本具體而微的匈奴史專著，因而此書的出版，為我國史學工作者運用馬列主義從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寫匈奴史專著，提供了一個先例”（林幹《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東北的學者曾提出“鮮卑學”研究的“第二個里程碑”，就是以《烏桓與鮮卑》一書為標志的（干志耿等《關於鮮卑早期歷史及其考古遺存的幾個問題》，載《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一書，字數雖少，但廣為中外學者所推崇，認為是利用考古文物資料（碑銘），結合文獻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的典範之作。其餘如《氐與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國》兩書，也在學界中有較大的影響，凡是研究這些民族的論著都要參考這些著作。

《叢書》所輯的另外五部著作，是馬長壽教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指導的研究生周偉洲教授所撰寫。周偉洲，男，一九四〇年生，廣東開平人。一九六二年西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師從馬長壽教授學習中國民族史（方向是藏族史）。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時代的變化，改革開放沖破了過去學術的某些禁區，創造了更為優越、寬松的學術條件和環境，因此，他在八十年代撰寫、出版了一批中國民族史方面的論著。《叢書》中收入了他的五部著作，《敕勒與柔然》是研究自匈奴、鮮卑之後，雄踞於北方大漠南北的敕勒（高車）和柔然的歷史著作，在國內尚屬首次。《南涼與西秦》和《吐谷渾史》兩書，則可視為鮮卑族（部分）遷徙到西北地區後，建立政權及開發西北的論著；《漢趙國史》則是南匈奴在

中國內地建立政權及最后融入漢族的研究著作。以上三書均可以說是在其老師馬長壽教授過去論著基礎上的細化和深入。《唐代黨項》一書，主要論述唐和五代黨項族的歷史，無論從中國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來講，此書均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作者據近年來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又作了一些修訂和增補。

《叢書》雖名為“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叢書”，實際上僅限於公元十世紀唐五代以前北方（包括東北、西北）主要的少數民族的歷史著作。按照馬長壽教授生前的計劃，是要按時代先后一本一本地撰寫十餘種中國古代主要少數民族的歷史著作。在他逝世前，正準備着手撰寫《吐蕃史》，然而，不幸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而他的學生們則因學術水平和能力所限，也無力完成這一宏偉的計劃，只有希冀於后輩學者們繼續努力了。就是《叢書》所輯的十部著作，因出版於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隨着時代的前進，學術的進步，現在看來，書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望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叢書》所輯的十部著作，因出版時代較早，印數不多，印刷質量欠佳，學界同仁和研究生們希望這些著作，特別是馬長壽教授的著作能再版發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獨具慧眼，精心策劃，以“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叢書”為名，再版上述著作，嘉惠學林，功不可泯，特致謝忱！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錄

(CONTENTS)

- 一 序言 1
- 二 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記的
關中部族 12
- 三 北朝前期的李潤羌和北魏造像題名的四種方式
..... 38
- 四 北朝後期鮮卑雜胡入關後的聚居和散居 50
- 五 渭河以北各州縣的羌民和他們的漢化過程 68

- 附錄一 關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錄的羌村十種
造像碑銘 87
- 附錄二 關於關中羌村羌姓的札記 99

- 校後補記 109

一 序 言

古代史志敘述關中部族者，以《史記·匈奴傳》、《後漢書·西羌傳》爲最早，其次是《晉書·北狄傳》和《江統傳》內的《徙戎論》。此外，在各史的四裔傳、列傳、地理志及若干類書、叢書內也可找到一些資料。但上述諸文獻都很散漫，求其能分區敘述、系統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專著是少見的。一九六三年寒假時，嘗以翻閱關中金石志爲事，每有所得，輒抄入日記簿上。所得略多，遂立意寫一論文，從碑銘推測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然此意屢起屢仆。以爲自歐陽修以來，企圖以碑銘證史補史者何止數百十家，他們的地位條件雖較優越，所做工作則大抵費力多而成功少。而我於金石素無根基，又無力搜羅關中各縣的碑碣和造像題名，若效顰古人，豈不貽笑大方？因此，有一段時間頗爲消沉。春節前偶到省博物館開會，武館長伯綸謂從渭南縣渭河北岸白居易故鄉運來北周武成二年造像題名一幢，題名中有白氏，未知與白居易有無關係。嗣後送來拓片四幅，其中羅列北鎮鮮卑雜胡姓氏數十種，殊形瑰異，得未曾有，讀後精神爲之一振。五月間往省圖書館碑帖檔案室參觀，借出舊藏關中羌村造像題名二十多種，十之八

九皆爲前人所未著錄。在解放前，陝西省的碑碣造像一度歸圖書館管理，從各縣搜拓而來的碑銘拓本亦羅置其中。後來省博物館成立，碑碣造像皆移交博物館陳列，碑銘拓本則分別庋藏於二館之內，造像題名一項在圖書館內所庋藏者更多。碑銘之物，古人以去古未遠，應較今人所見既多且確。但上述二館所藏的碑銘，不特爲從前的外省人所不知，即渭南武樹善在修《陝西金石志》時（1935年）亦未曾寓目。我於不經意中得之，不禁狂喜移日，以爲自解放以來，一切文物都隨從革命事業而獲得解放，今人所見又何會多遜於古人呢！因不揣淺陋，草成《前秦至隋初關中部族的分佈和關係》一文，希望從題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親屬關係，略以闡明關中古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佈、姓氏變遷、婚姻關係、階級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其他關於北朝官制和地理沿革等問題。因爲作者的水平限制，碑銘中有些問題或者看不出來，或者闡述錯了，都在所難免，希望專家同志們不吝賜教，給以糾正。同時，更希望各省市縣的文物機構，注意收集碑銘資料，供給學術界的同志們，使他們利用這些資料，對各地方史和民族史作出新的貢獻。

這篇論文所根據的主要碑銘爲下列的二十五種：

一、前秦建元三年（367年）《鄧太尉祠碑》

碑今在蒲城縣城東北七十里之東河川，即洛水的西岸。碑原在蔡鄧鎮東南二十里之鄧公（鄧艾）祠內。祠側有鄧公墓，係衣冠塚。一九二七年宋哲元擬運此碑至西安，先移往東河川，後因事未果，遂擱置於此。碑文在陸耀遙的《金石續編》卷一、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十、毛鳳枝的《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都有著錄。

二、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廣武將軍口產碑》亦名《立界山石祠碑》

碑在白水縣城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碑文載入王昶的《金石萃編》卷二五，但缺少碑額題字和兩側題名。

三、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

碑原在澄城縣北北寺村附近，一九一八年移置城內南門街初級中學內。碑文在武樹善的《陝西金石志》卷六、毛鳳枝的《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都有著錄。

四、北魏神龜二年(519年)《夫蒙文慶造像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五、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雷漢王等造像記》

碑在耀州。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六、北魏永熙二年(533年)《邑主佛蒙口娥合邑子卅一人等造像記》

碑在今銅川市黃堡鎮。前人皆未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七、北魏《雷樹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耀州。碑文無年月日，按像主之官銜和碑文字體，當為北魏時的造像題銘。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八、北魏《邑子羅暉造像題名》(殘)

碑在藍田縣。碑文無年月日，字體屬北魏。碑文在《關中金石文字新編》卷一中著錄。

九、西魏《焦延昌造像碑》

碑疑在富平縣。碑文無年月日，據王昶考釋當在西魏，載入《金石萃編》卷三二。

一〇、西魏大統十年(544年)《邑子廿七人造像記》亦名《僧習等合邑子廿七人造定光佛寺記》

碑原在舊咸寧縣南關(在今西安市東城)社祭台村石佛寺(唐代名青龍寺)內。碑文載入《金石續編》卷二及《咸寧縣志》。

一一、北周武成二年(560年)二月《王妙暉等造像記》亦名《王妙暉等五十人造像銘》

碑在咸陽縣渭河南岸。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三六。

一二、北周武成二年(560年)九月同州延壽郡下邽縣《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

碑原在渭南縣渭河北岸信義鎮西二里之秦莊村，今已移藏陝西省博物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一三、北周保定元年(561年)《雷文伯造像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一四、北周保定二年(562年)《邑主同瑀龍歡合邑子一百人造像記》

碑在耀州。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一五、北周保定四年(564年)《聖母寺四面造像碑(銘)》

碑在蒲城縣。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三六。

一六、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同瑀氏造像記》

孫星衍等《寰宇訪碑錄》謂在長安，不確。按其姓氏當在銅川縣或渭北的其他縣內。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三六。

一七、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記》，亦名《邑子一百二十八人造像記》。

碑在蒲城縣北的堯山鄉。碑文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二，《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都曾著錄。

一八、北周天和五年(570年)《宇文達造像記》

碑在咸寧縣，今西安市東郊。碑文載入《金石萃編》卷三七。

一九、北周天和六年(571年)《雷明香爲亡夫同瑀乾熾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明。從題名中的建忠郡大學生雷鴻遠和宜州大學生雷海傍言之，當在渭北三原縣或耀州一帶。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二〇、北周建德元年(572年)《邑子甍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

碑當在銅川、白水二縣間，詳細地點難考。碑文載入《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

二一、北周《郭羌造像記》(殘)

碑在耀州。按郭羌的官秩爲宜州從事，宜州的州治在華原縣，即今之耀州，爲西魏廢帝三年(554年)所置，此碑當屬北周。此碑未見著錄，拓本分存陝西省圖書館、博物館。

二二、北周《荔非明達四面造像題名》

碑所在地不詳，或云在華州。造像亦無年月，唯題名中有“越公府行參軍”，越公府即越國公府，乃北周封爵，此碑疑是北周造。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

二三、隋開皇二年(582年)《邑主雷惠祖合邑子弥姐顯明等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二四、隋開皇四年(584年)《鉗耳神猛造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碑記和題名的一部分載入《陝西金石志》卷七。全石拓本在陝西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和省圖書館。

二五、隋開皇六年(586年)《邑主弥姐後德合邑子卅人等造像記》，附唐乾封元年(666年)《高荀子合邑子廿五人改造佛像記》

碑所在地不詳。此碑未見著錄，拓本今存陝西省圖書館。

上述碑記和造像題名共二十五種，其中十三種已爲前人所著錄，但有兩種著錄不全，不見前人著錄者十二種。未著錄的部分盡可能地都抄錄一份，有兩種收入本文內，其他十種編入附錄一內。已著錄的部分，或因紀錄不全，或因釋文錯誤，其中特別是《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口產碑》，以其關係重要，我把兩碑的全文詳細校勘一次，加以補正，亦收入本文之內。

從時間分配和地理分佈言之，上述二十五種碑銘，屬於前秦者二，北魏者六，西魏者二，北周者十二，隋初開皇年間者三。從前秦建元三年(367年)至隋開皇六年(586年)凡二百一十九年，前後包括了六個朝代。在此二百多年內有二十五幢碑銘作爲研究的資料，而且除了後秦以外，每個朝代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碑銘

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一點是比較令人滿意的。碑的原在地，屬於蒲城縣者三，耀州者七，白水縣者一，渭南縣（渭河北岸）者一，澄城縣者一，富平縣者一，宜君縣者一，銅川縣者一，銅川、白水二縣間者一，以上十七碑石都在渭河以北。又屬於藍田縣者一，舊咸寧縣今西安市東城東郊者二，咸陽縣者一，以上四個碑石都在渭河以南。此外，尚有四碑所在地不詳，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唐代以前關中的羌村大都在馮翊、北地二郡，換言之，即羌民的造像題名碑應在渭河以北，不在渭河以南。直至唐時，這種情況仍然照舊，只有少數的羌族官吏將士從渭北移居長安一帶。關於此點，最後一節還要提到，在此不贅。

從前秦到隋初的二百幾十年內，關中部族的分佈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四二六年北魏佔領長安以前為前期。在前期內，關中部族以氐、羌、匈奴為主。自四二六年以後，拓跋鮮卑和其他北鎮雜胡相繼入關，特別是五二八年爾朱天光率領賀拔岳、侯莫陳悅兩軍圍鎮壓關西各族人民起義和五四三年魏孝武帝率領六坊之眾及文武官吏入關以後，關中遂成為鮮卑雜胡政治活動的集中地區。西魏和北周的兩代政權就是以徙入關中的鮮卑雜胡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此為後期。但無論如何，自東漢迄於隋唐，關中的少數部族始終是以氐、羌、匈奴為先、為主出現於中國的歷史舞臺的。關中之氐在西晉時即列入編戶，與西羌、匈奴直接統率於部落大人之下者有所不同。氐人和漢人的融合約在北朝時期。北魏北周雖亦出兵征伐氐族，但這些氐族分佈在南秦州、梁州等地，不在關中。羌族的融合比較遲些，約在中唐以後。次於氐、羌者為匈奴。匈奴於漢時入關，十六國時稱“東、西曹”，盤踞在貳城（黃陵縣西北）的東西。北魏滅赫連夏以後，其族更以“稽胡”之名出現於上郡一帶，直至唐代中葉始銷聲匿跡，與延河流域的漢人相互融合。北鎮鮮卑雜胡入關者多，來勢亦洶，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為部族集團，而僅以一種少數部族的成分出現於朝廷、戎伍、閭里之間。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

積、白居易之流，外人尙能指出其爲某某部族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却儼然以漢胄自居，不復承認自己的少數部族成分了，這種情況正可反映鮮卑雜胡的漢化比較更早一些。關中古代部族的始末，大致如此。

下文即圍繞着上述前後兩期關中少數部族的情況加以敘述。但如衆所知，只靠碑銘資料是很難反映出部族歷史的全貌的。即使比較簡單的部族分佈和關係，只靠碑銘也很難反映出來。因此在每節之內或多或少必須援引一些其他文獻以佐說明。下節敘述《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產碑》所反映的關中部族情況。但此兩碑只能反映馮翊護軍、撫夷護軍和□產所管轄地區的部族種類、區域劃分、官吏兵士的設置等等，至於從漢到晉關中部族的由來，前後二趙與關中部族的關係，則必須事前加以說明。現在藉序言尾端，略補述苻秦建元以前關中部族的由來如下。

漢代以來，匈奴、氐、羌及其他雜胡以不同時期徙入關中。匈奴人徙有兩大波瀾：一在漢元狩三年（前120年），昆邪王殺休屠王，率衆四萬餘人降漢，武帝置五屬國以居之。此五屬國在安定、上郡、五原、天水、西河五郡的塞外。當時匈奴已遷到關中東、西、北三邊的周圍，其中上郡、安定二郡都屬於關中範圍。二在東漢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降漢，光武帝處之緣邊八郡，其中朔方、西河二郡與關中密邇相接，北地郡在安定的蕭關以東，其屬關中更無疑義^①。西羌之人關始於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當時馬援爲隴西太守，鎮壓西羌，徙置三輔，於是扶風、馮翊，遠及河東空地皆有羌族與漢民雜處^②。越到後來，西羌之人關者越多，除三輔外，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無不有羌。氐人原來分居在漢代武郡的武都（甘肅成縣西北）、隴西郡的氐道（甘肅秦安縣西南）、

^① 關中以在函谷、武關、散關、蕭關四關之中得名。蕭關在隴東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地古屬安定郡。北地郡更在其東，治富平，今慶陽縣。

^② 《後漢書·西羌傳》、《晉書·江統傳》。

天水郡的略陽(秦安縣西北)和清水(甘肅今縣)等地。漢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武都郡,原居武都的氐人一部分被排斥在汧水、隴山之間(在陝西隴縣西北)^①,此為氐人西入關中之始。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略陽興國城的氐王隨馬超起兵。後氐王從超入蜀^②,所遺部民數萬落,曹操徙之於扶風之美陽(陝西扶風縣北)^③。氐人入關中者至此益衆。到西晉前葉,關中各地的少數部族在原來的基礎上更有所擴展。郭欽上武帝書云,上郡、安定、北地、馮翊四郡都有匈奴,京兆郡有雜胡^④。江統的《徙戎論》謂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都有羌,扶風、始平、京兆三郡都有氐^⑤。關中的少數部族既多,所以《徙戎論》云“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的人口多到與漢族的人口相等,這在當時顯然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了。部族雜居的問題,第一是容易產生部族衝突,第二是糧食供給不足。自曹魏以來,漢族士大夫如鄧艾、郭欽、江統之流相繼痛陳戎狄內徙之害,建議徙戎實邊之策,端由於此。但此時關中的人口稀少,縱百餘萬口尚不及漢盛時戶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在統治階級看來,若不許戎狄內徙,則不特田賦課稅無所出,即征兵徭役亦感覺萬分拮据。所以當時建議者雖憤慨陳詞,而朝廷在咸寧、太康間仍不斷允許匈奴等族入塞。這樣,關中的少數部族跟着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了。

十六國前趙時,劉曜都長安,并州的五部屠各從此大量徙入關中。屠各一稱“休屠各”,原係匈奴休屠王及其部衆的後裔。其降衆之居五原、河西二郡者,東漢時歸南匈奴管轄,後來便成

① 《三國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

② 《三國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三國蜀志·馬超傳》注引《典略》云氐王入蜀在建安十九年(214年)。

③ 《三國魏志·張既傳》云:“太祖(曹操)乃自到漢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其事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④ 《晉書·北狄匈奴傳》。

⑤ 《晉書·江統傳》。